

主编 / 陈启智 张树骅

儒商

与

二十一世纪



齊魯書社

儒商与二十一世纪

主 编：陈启智 张树骅

副主编：孙聚友 翁惠明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商与二十一世纪 / 陈启智, 张树骅主编.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1

ISBN 7-5333-1252-X

I. 儒... II. ①陈... ②张... III. 儒家—道
德规范—作用—商业经营—研究 IV. F7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372 号

儒商与二十一世纪

陈启智 张树骅主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2 插页 373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252-X

B·161 定价: 32.00 元

前 言

1999 年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孔子诞辰 2550 周年。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儒学发源地。为了纪念孔子诞辰,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济宁市人民政府、国际儒商联合会(香港)、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山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与中华孔子学会五家单位共同承办的“儒商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999 年 9 月 25 至 28 日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此次会议得到了中外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其中捐资单位有国际儒商联合会(香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等。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瑞典、冰岛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企业家 160 多人,既有在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领域具有杰出成就、享誉世界的硕学宿儒,又有以儒家思想管理实业而作出非凡贡献、造福民生的企业家。会议收到论文 60 多篇,这些论文围绕着会议议题,对于儒学与儒商在二十一世纪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其发展态势等问题,特别是关于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儒商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现代儒商与知识经济、儒商

在二十一世纪金融体制改组中的地位和作用、儒商精神与西方伦理经济学的比较、中西经营管理思想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体现了中外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崭新观点。

为了促进儒商与二十一世纪这一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展示本次研讨会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儒商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决定将收到的会议论文结集出版。

目 录

成中英: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命运:全球化经济发展 与儒学及儒商的定位	(1)
赵 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儒商	(12)
刘蔚华:什么是儒商?	(15)
郑永仪: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	(17)
永安幸正:存在于全球经济时代的儒教和经济伦理 ——它在现代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22)
陈启智:儒商的现代意义与未来作用	(29)
戴斗勇:儒家伦理模式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	(54)
李润和:儒学与 21 世纪东亚世界	(58)
羊涤生:世纪之交的儒商	(63)
李镇高:儒教价值与韩国经济	(71)
贾顺先 唐平:儒学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和 21 世纪的作用	(76)
裴传永:孔子义利观的基本内涵	(86)
郑克中:中国古代抑商思想源考及其陷入的理论误区	(90)
葛荣晋 屈桂英:儒家思想与现代儒商	(94)
曲 直:道德架构是儒商的重要特征	(104)
蒙培元:漫谈孔子学说与市场经济	(108)

高晨阳：“理性经济人”的缺失与儒学道德理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118)
周有泉：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领导新潮流	(128)
丁原明：儒学在东亚工业化中的正面效应 ——兼论儒学在今后的调整	(133)
刘 凌 宋其梅：“路径依赖”与“儒商精神”	(137)
张清津：儒学、儒商与未来中国经济潜力	(141)
卢新德：简论儒学与东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145)
李守庸：儒商风范——企业家应具备的品格	(155)
曹 涛：界定、扬弃与迎战——再论儒商与儒商文化	(160)
刘桂莉：儒家的人本思想与知识经济	(168)
杨瑞文：儒商和中国人的关系、亲情、与天伦之乐	(175)
骆承烈：孔子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182)
王静厚：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商	(199)
周桂钊：中西管理思想的差异	(210)
潘大德：爱人重教致中和——试论孔子的治理之道	(216)
赵泽洪：东亚儒学与世界前途	(220)
柳海松 葛郁柏：儒商与知识经济时代的 企业运营管理者	(228)
林国雄：由新儒学四象结构剖析制造业厂商 的会计资讯	(237)
崔正森：略论晋商的成功之道	(243)
李元庆：晋商文化觅踪：从春秋战国晋地商业的 繁荣到明清时代晋帮商人的崛起	(254)
周祝英：发扬创新精神 迎接知识经济	(257)
孙聚友：论儒家管理的本质	(261)
陈德述：儒家的礼与现代表理	(291)

李道刚:恪守与更新——写在下一个世纪来临之前	(296)
刘宗贤:跨世纪儒学研究的思考	(300)
宋志明:时代呼唤平民化的儒学	(305)
梁宗华:儒学传统与现代经济伦理建构	(309)
彭立荣:论儒商商德与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	(313)
朱方褒:儒学与儒商如何迎接二十一世纪 的挑战与选择	(323)
孙君恒:外国人士对儒家伦理的赞美	(331)
董 操:儒学·教育·知识与二十一世纪	(340)
徐道一:“和为贵”思想在 21 世纪的重要意义	(345)
徐湘霖:论决策主体之“三德”	(348)
田畑光永:儒教与亚洲经济发展	(358)
路德斌:限度与条件:儒学之现代价值及未来命运	(362)
唐任伍 章光文:儒家“忠”道观念与 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	(365)
杨先举: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374)
杨晓伟:现代化的陷阱	(377)
李 军:略论儒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385)
万 青:现代儒商与知识经济	(390)
何叔明: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谈儒家的道德价值	(394)
杨子彬:遵循“综合创新”的文化规律,变东西文化 冲突为东西文化协调,共同创造 人类文化的新世纪	(401)
刘玉录:将儒家文化融入二十一世纪生产力	(406)
尹建平:运用儒家思想 建设以人为本的	

现代企业文化	(408)
党明德:以健康的心理适应环境,公平竞争以取胜	
——论儒商思想对企业灵魂的影响	(414)
王保平:儒商成功二十二条法则	
——孔子文化思想与儒家经营之道	(419)
沈幼琴 Ake Sahlberg:儒学的和谐与瑞中咨询公司	(423)
柯远扬:“金得利”企业文化与孔子儒家思想试探	(426)
福建惠泉集团:东亚管理模式为国有企业的快速	
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428)
福建福日集团:传统加开拓、建设具有现代企业	
管理特色的企业文化	(445)
王行昭 张智聪:儒商精神是建构企业文化的	
根基与沃土	(458)
韩振生:论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	(473)
邢 凯:论儒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	(491)

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命运：

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儒学及儒商的定位

美国夏威夷大学 成中英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首在面对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新趋势作出深刻与前瞻性的了解,然后进而省思中国文化的潜力与优势何在,积极开发此一潜力与优势,以适当与智慧的方式切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动态潮流之中,形成主导的力量,如此,则不但将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杰出的贡献,而且将对全球人类安身立命的福祉与人类社会和平繁荣的生活发挥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我在此先就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客观的理解。

什么是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呢?回答是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在建立全球的统一经济市场,期使货畅其流而物尽其用,此一经济的全球化是一个世界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切合人类需要的历史发展大方向。但这一发展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更重要的是:如果人类掌握的决策智慧与关切理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运用,它就能使人类走上共生共存、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之道;更进一步说:它的好处是将节省人类已有的生产资源,开拓人类的经济发展空间,促进财富的宏观面的平均分配,使全球各地区逐渐形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互补与互动的机动过

程,因而同时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刺激人类发明、发现的创造力,以及推行人类各行各业的协作力并维护彼此依存的活力。这是由于全球化的经济是以全人类为消费对象,以全球场所为市场,当然也假设全球每一个地区都有发展的动力与潜力,都能参与发展与竞争和合作,而且能够作出合乎理性、合乎公平的策略裁断与制度规则。

相反的,如果人类无能克服纯粹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动机与做法,而且处处维护既得的非法利益,不断追求统治他人的权力扩张,全球化只会带来少数族群的权力驾驭与财富集中,而大多数国家与大多数人群将沦于贫穷与不幸。因之,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只是人类走向灾难的开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显然是在国际资本投机集团在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动机下利用全球化的大环境制造的利益掠夺。此一风暴所造成的东南亚的社会灾难是难以估计的,这一灾难的前因后果明显的说明全球化所蕴涵的各种可能性,也说明了全球化是一个对人类社会可好可坏的理性工具化过程,同时也说明一点:全球化事实上是一个尚未完全界定的人类活动过程;此一活动一方面在寻求开放,寻求自由,寻求从因循历史的制度与个别国家的制约中走出来,为的是提高经济活力与社会福利,为的是更好的使人类全面受益。因而,另一方面,它需要全人类用最好的共同智慧来界定与规范,需要人类各传统、各地区都能参与,都能受惠,然而却偏偏有投机者、阴谋家利用一己之所长、他人之所短,获取非法暴利,这虽然不是全球化这一过程的罪恶,但却把如何参与全球化、如何面对全球化的价值态度与经济行为的伦理问题暴露出来。

在这一正负双重角色对经济全球化的分析理解下,我们看出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经济伦理来规范、来改善:规范新

的结构,改善旧的条列;更需要一个全球化的人类整体伦理来引导,来批判、引导未来的方针,批判已有的建制。全球化提供了人类一个整饬行为、检视价值、发展人类创造潜能、通和人类族群、开拓人类善良根性、充实人类文明内涵、提升人类人格品质、建立人类共同远景与大同理想的大好机会,在这一大好的机会下,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儒家儒学作为一个文化理想、一套社会价值体系,和一个人类整体伦理系统的密切相关性和重要性。更明确的说,儒家及儒学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勾画出一个基本的价值方向、社会蓝图、行为规范的思想系统,这在现今经济全球化的网罗与趋向中,此一意向已能更鲜明的表彰出来。事实上,孔子提出儒学的基本思想之时也正当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孔子之能于斯时提出,并充满理性与激情的提出他的价值观与文化理想也正是因为孔子能深切体会到他所处时代的变革性,体会到人类历史有正负两面双重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在深度的历史反思与对人类前景的憧憬下,义不容辞、仁不容己的投入启蒙社会、教育年轻人的济世工作,并在他与弟子们的答问中充分的表达了他淑世的情怀,展现他仁德的智慧。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不止是说他能应时用世、应运而生,也意涵他掌握了变革的智慧,懂得通变之道,但又坚守其德教的宗旨、人生与社会的价值观与对人性修持进于至善的愿景。

基于以上的理解,儒家与儒学对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与时切性可想而知,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全球化亟需一个具有普及性的经济伦理,也为此更需要一个具有普及性的人类社会伦理。关于这点,理由也很简单,经济全球化既是一个工具理性的实践过程,它必须以社会的总体需要为基础,也必须以达到社会的全面进化与发展为标的,因之,经济全球化只是人类社会和谐交流与人类文化平等沟通的一个基石,同时也是一个方面,它必

须在人类共同的善意与共同的理想的认识下进行,正如经济离不开社会、政治与文化,经济全球化的活动与努力自然也离不开社会的交往、政治的商议与文化的融合,人类各地区能不能自经济全球化走向社会共同体化、政治协作化以及文化和谐化(而非如亨廷顿所说的文化冲突化)是需要历史来考验的。但明显可知的是:没有经济全球化与东西文化的充分融合与互解,东西方社会与政治的协作与良性互动是几乎难以想象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能够逐渐凝合成为欧洲社会与欧洲政治共同体,其巨大的凝合力无疑来自于欧洲各国的共同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这自然也说明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经济伦理的作用,全球经济伦理的作用,以及社会/文化伦理的作用与全球社会/文化伦理的作用。儒家哲学显然提供了最具普及性的社会伦理与文化伦理,同时,儒家哲学与儒家社会/文化伦理也必须成为儒家经济伦理的基石与资源。

在下文中,我将界定儒家伦理与儒家经济伦理,并为儒商进行全球化的定位。首先我要指出儒家伦理本身就包含了强烈的全球化色彩。在儒家的经典中,我可以举出三则具有纲领性质与鲜明目标的话作为人类普遍性的儒家伦理的说明,这些引言也说明了什么是儒家哲学自始至终所坚持的重大与崇高的历史使命与文化理想。一则是《大学》说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德,在止于至善。

此段话表明个人德性修持的重要性,只有在个人德性的修持的基础上,社会或社群才能亲和的发展,只有在此两者的基础上,人类才能追求与获致最高的善。西方伦理有直线的超越的个体化的发展趋势:寻求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功利,漠视涉及全体的责任与德性。但什么是最高的善或至善呢?显然,它指的是人类全体既分享又共享的高品质、高德性的和合状态,它在全体

的责任与德性中包含了个体的权利与利益。此一状态的最好说明则是《礼运·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虽然，人类对至善的理解是一种理想、一种憧憬，但有此理想与憧憬（所谓愿景），人类才有向上的努力与追求，才能发挥创造的意愿与动力。就现代人类已经开发出来的科技与已经积聚的经济财富来说，人类全体的共同努力已经能够达到超过小康趋向大同的局面，但为何我们所处的世界还是如此多灾多难，如此离析分崩，如此千疮百孔？这就必须要归之于人之为人的一般品质的种种缺陷：知识的缺陷，德性的缺陷，判断的缺陷，动力的缺陷等等。人的爱他利他的道德精神还需要开发与有待开发。再者，如果社会伦理与人格发展的文化伦理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的发展与天下（全球人类）的和平繁荣，则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能的君子）都应该是一个既有德又有能的贤人或圣人（有德的君子），足以带动人群，激励人心。儒家圣贤的理想实际标明儒家对一个人之作为君子之德与能可以发展到治国平天下境地的信念。虽然，此一境地不一定完美具体实现，这却是儒家对人的发展不断的要求与策勉，儒家甚至把此一理想的实现投射到远古的历史上，形成尧舜德治的范型，《尚书·尧典》说古尧帝是：

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这种从个人的修齐发展到国家天下的治平的过程显然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可说是根源于《论语》中孔子所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意思。在孔子,每个人都是可以修齐成贤成圣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能力,有了此一能力并发挥之、实践之与实现之,也就能启发他人,感化群伦,自然治平天下,犹如顺水行舟,易如反掌了。虽然,我们说这是一种理想或假设,但这一理想却具有充分的逻辑性,因为如果人人都能有道德、讲仁义,基于道德共识建立的法制也就易教易行,尊重道德的决策与法制,天下就自然形成了道德的秩序,最有德者的圣人只要南面而王即可。此一理想也最能鼓舞人心,因为它是对人性有如此的信心,对德性的力量有如此的信念,在最自然的情况下自然也最能诉求于人的自然感情。孟子极力求证人性的本善也可说是在此一理想的感召下体悟到必须从人性的深处去发掘修己成己成人的动力根源,他称之为良知良能,因而进一步赋予了善性以自觉性以及与本体真实的相应性与连贯性,所谓合内外之道就在于内(性)之善与外(天)之本有一个整体中的内在的一贯性与连通性。这也可说是孔子晚年对子思的影响所及。在天命与心性、心性与道德统一的基础上(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德)),儒家伦理之具有普遍性乃在其界定了人的本质的起点,人的发展本性的能力以及一系列的身体力行的具体实践过程。换言之,儒家伦理不只是伦理,不只是仁学,且是人学,人的本体学,人的道德创化学,且与天地的本体学与宇宙论息息相关,互为主客,关于此点,我在另处有所详述。

孔子所举之仁是儒家的中心概念,孔子解说仁为“爱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仁的理念基础上,孔子提供了一个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但仁在人性得天命的基础

上已具有本体论的意涵,在与天地一体的宇宙论结合起来,就构成一种渗透万物的关切情怀与生命体验,此一情怀与体验既是性又是理,因为它可以内化为性、外化为理,这就是我前面提及的关切理性(英文可译为 rationality of common care)。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生动的表现了这一关切理性,甚至可说从一个儒家仁的情怀更具体的显示仁者的广泛抱负与使命感。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不但看出儒家、儒学与儒家伦理的全球普遍性格,也可以进一层理解儒学之为关切理性之学的新解。我们可说凡是关切人生、关切人际伦常、关切人之自身发展与社会他人与社会全体的合德合理的发展,都是儒学,固无论其为自觉或不自觉,但儒学还要积极主动的实践此一发展,并力求达到一定的高尚品质的道德和谐之境。这一意义的儒学是综合历史儒学的精华而形成的,它的意义与重要性在它标明了在人类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的人的重要性与人的自觉与主动自我修持的重要性,没有此一人的自觉为中心的关切理性,任何全球化的发展都有可能步入歧途,唯有自觉人的责任与人的关切理性,才能确保全球化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因为唯有此,吾人才能集聚众力在人的发展的起点、过程与追求的最终理念与理想上进行省察、检验与更新。

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儒家伦理扮演着一个既促进经济发展又平衡经济发展的角色。为了要发展人的潜力,更为了要发展群体的人的福祉,包含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经济的发展是理性的工具,德性促进理性,理性满足德性。儒家的伦理必须坚持方法与手段的合理性与合德性,即使经济能达到善的目标,但实行经济的条件与过程仍然要符合最基本的德性,也就是要重视人的目的性与人的德性尊严的维护。在此一原则的要求下,

显然我们可以从儒家伦理的立场探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劳心与劳力工作建立的条件,维护工作场所安全的条件,报酬升降与人事奖惩的条件等等经济伦理的实质问题。在经济分配的领域中,儒家伦理更要强调手段与过程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在这些重要的细节上,儒家伦理提供了一个关切理性的观点:是不是有人性与人道的关切?是不是能对人的关切作出理性的说明与策略性实施方式的安排?因之儒家的伦理就在一般的经济伦理中发挥其关切理性的作用,形成了具有德性主义与人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经济伦理。

有了儒学、儒家伦理及儒家经济伦理及其全球化定位的正确的现代理解,我们也不难看到儒商一辞真正的涵义了。什么样的从商者或企业管理者与负责者才可以称为儒商?我想我们在此可以区分两种意义或两种层次的儒商,第一种意义或第一个层次的儒商是从商者或企业管理人服膺与实践儒家的社会伦理与经济伦理,在一般的社会事物与特殊的经济事务上都能自觉及有恒或系统的履行与表现儒家关切社会和谐、文化创造活动的精神,对于经济事物更要强调儒者重人的风范、人性的关怀与人性的生活安排以及待人处世力求公平公正之道。所谓“重人”可说有三个意思:一是重人才,贤能并重,并鼓励教育提升;二是重人事制度,尤其不应因个人关系影响到人事的公正;三是重人际和谐关系,并以和与合为企业文化的主体,这也是我在我写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中一再强调的。

第二种意义或第二个层次的儒商则只在经济事物上着眼儒家的社会伦理与经济伦理,并将之转化为管理之用。但在一般的社会事物上却不甚在意是否自觉与恒常履行与表现儒家关切社会和谐与一般的人道淑世精神及文化创造活动,此一要求的重点是自觉与恒长甚至于系统化。第一意义或第一层次的儒商